

濠镜浸润先驱魂

王杰 李振武

近代以降，就地域面积而言，澳门作为香山县治下的一个仅有几平方公里的小小半岛，与以千万平方公里计的祖国辽阔国土相比，可谓微不足道矣。然而，就地域地位而论，澳门这块地处南疆边陲的热土，在饱经西方殖民主义蹂躏的同时，接受了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和融通，成为中西经济、文化最早的交汇点，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惊天慨世的乐章：它既是西方列强侵华的跳板，鸦片走私和“苦力”贸易的基地；又催促着许多怀着爱国热忱的先贤们以此为眺望世界的窗口，在这里开始“接触”西方，睁眼看世界，进而探索和构建着救亡与变革的方案，演绎出一幕幕令人荡气回肠的历史活剧。本文意欲以此为线索，勾勒出近世思想先驱与澳门关系的历史画面，以缅怀先贤们从此走向世界舞台的大步足音。

林则徐藉澳门“探访夷情”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不仅仅领导了“虎门销烟”并坚决主张抗击英国侵略者，而且还主动了解西方列强的情状，以把握回应西方、臻中国强盛于世界的理据，澳门则是他“睁眼看世界”的初始窗口。

林则徐虽然一向主张严禁鸦片，但他最初对鸦片的认识却是幼稚甚至是错误的，这是清王朝长期以来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使他无法接触海外世界的结果，比如：他在湖广总督任上时，曾“遍访鸦片来由”，认为鸦片“实皆港脚奸夷所带，与英吉利国之修职责者殊不相涉，不过狡黠市侩，各牟名利，并非有总汇之处、主使之入”^①。至于鸦片的具体产地、洋商是如何将鸦片偷运进中国的诸类问题含混不清。当道光皇帝把在广东海口彻底肃清鸦片源头的重任压在他肩头的时候，身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一方面因皇帝的信任殊感荣耀，一方面倍感责任重大。毕竟，深谙“知己知彼，百战不

殆”道理的林则徐有悟性，要想彻底禁绝鸦片，必须对走私鸦片的洋商有详尽的了解。这样，澳门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他的视野：因为当时的澳门已租置于葡萄牙人管理，成了清政府与西夷们打交道的前哨站，一切欲去广州的船只都必须通过并停泊这里，接受检查后才能领到前往广州的通行证。一本由报告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合著的有关鸦片战争的著作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澳门的描述——“时止鸦片战争，以西方标准来衡量，澳门已是中国土地上最现代化的一座小城市了。租地里挤满了各色欧式洋楼，街道下面已有中国最早的城市下水设施；酒吧和舞厅夕夕灯红酒绿，打发着远离故乡的航海者多余又必须的时光；港口、仓库、马路，建筑和设备一应西方当时的最新样式。依一份西方人的统计资料，当时常年生活在澳门的西方人，已近万人之数。引人注目的是，女人比男人多四百余人，这大约是贸易为生的民族的居地特征。”^②

林则徐通过澳门“探访夷情”的最重要手段，乃是组织力量翻译《澳门新闻纸》。所谓《澳门新闻纸》，概指来自澳门的报纸，其中有部分在澳门出版，如《中国丛报》；有些则在广州出版，如《广州周报》、《广州纪事报》；还有在外国出版的，如《新奇坡新闻纸》（《新加坡自由报》），《孟买新闻纸》、《兰顿（伦敦）新闻纸》、《加尔吉打新闻纸》及澳大利亚的《腮呢新闻纸》等。翻译的内容涉及有关中国的时事报道和评论、鸦片的走私情况、广州海关和水师官员受贿的因由、各国对中国禁烟的反映、西方列强在中国周边及邻近国家的殖民活动等方面。

初始，这些外文报刊是“零星译出”，林则徐感到“散漫”，不便查阅和保存，不久便下令按时间顺序把译稿抄齐，“统钉数本”^③，按期送上，从他到广州至革职待办，一直没有中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夷情”材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鸦片战争》一书中所收录的《澳门新闻纸》六册，就是根据邓廷桢后人提供的原件而公诸于世的。林则徐在《致怡良书柬》中多次谈到利用《澳门新闻纸》了解敌情一事。1839年4月，他转送新闻纸译稿数本给怡良，在附函中写道：“惟其中颇多妄语，不能据以为实，不过借以采访夷情耳”④。1840年1月18日，他在信中说：“昨译出最近之新闻纸，顺送一览，可乘便与厚奄（即豫坤）一阅”⑤。3月3日，他又在另一封信中提及：“顷澳门来禀，谓英夷到一兵船，想已鉴入。查此船即九月新闻纸内所说要来中国调停各事者。今既来此，只可严防”⑥。3月7日，他致书怡良“于新闻纸中抄译夷信六封进呈”给道光帝御览，在折片中他解释此举乃因“现值防夷契紧之际，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⑦。9月间，他收到邓廷桢来书和所附奏稿，参照新闻纸了解英军攻打厦门的情况，驰信怡良：“厦门事，前此传言太过，昨于该夷新闻纸中，见其毫无夸张之语，心窃疑之，若如折内所言，则以告者过矣”⑧。在被革职留广州待命期间，他仍坚持组织翻译新闻纸，1840年11月间，他致怡良书有曰：“盖新闻纸内所论，本谓星使（指琦善）此来，不过拖延之计，非用武不能了事”⑨。后来，他还建议请逆将军奕山“宜周密探报”外国情况，他说：“又有夷人刊印之新闻纸，每七日一礼拜后，即行刊出，系将广东事传至该国，并将该国事传至广东，彼此互相知照，即内地之塘报也。彼本不与华人阅看，而华人不识夷字，亦即不看。近年雇有翻译之人，因而辗转购得新闻纸，密为译出，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虽近时间有伪托，然虚实可以印证，不妨兼听并观也。”⑩

为翻译“夷人刊出之新闻纸”，林则徐专门组织了一个力量颇强的翻译班子。有名可考的，一位是梁进德，《劝世良言》作者梁发的儿子。⑪麦洁恩在《梁发传》中说：“他的儿子进德于林则徐抵粤后即被聘为英文翻译员。进德为林钦差担任几种工作，一种工作是将那些在澳门出版的英文周报译为华文”。⑫另一个是在马来亚槟榔屿和马六甲受过教育的华侨青年袁德辉，魏源所编《海国图志》中收有他的译作。

通过浏览、研究《澳门新闻纸》林则徐对洋商及其所在的国家有了一定的间接了解，使得他在制订禁烟策略和具体措施时尽可能避免盲目性和瞎指挥。比如他从新闻纸中得知英军来华，准备北犯定海、天津的消息，先后“奏请敕下筹防，计已五次”⑬

并且在广东作了未雨绸缪和力所能及的抗战准备。

亲临澳门，是林则徐了解夷情的另一个重要途径。1839年9月3日，林则徐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前往澳门巡视。林此行的目的在于：一、震慑留驻澳门的英国鸦片贩子，让他们明了天朝禁烟的决心。澳门的高楼街、山水园、白马行街、十六柱街是当时外国奸商藏匿、贩卖鸦片的“黑窝”，此前，虽然林则徐采取严厉的禁烟政策，但仍有葡萄牙商人“将鸦片存贮夷楼，贩卖渔利”⑭。林则徐率领随员沿途抽查葡人的楼宇居室，看其是否与户册人口相符；巡回葡人租给英商的房间，看是否已经关闭；访查英国鸦片贩子是否已被驱逐。此举对鸦片贩子的嚣张气焰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二、争取澳葡当局对禁烟的支持，将英国鸦片贩子逐出澳门，以巩固禁烟成果。林则徐传见澳葡官员，“宣布恩威，申明禁令，谕以安分守法，不许囤积禁物，不许徇庇奸夷”。澳葡官员则向他表示：“二百年来，葡人在澳门“长保子孙，其安乐利，心中感激，出于至诚，何敢自外生成，有干法纪，现在随同官宪驱逐卖烟奸夷，亦属分内当为之事”⑮；三、体会澳门夷人的风土人情。林氏在日记中如是描述了他的澳门观感，“夷人好治宅，垂楼叠屋，多至三层，绣闼绿窗，望如金碧。这天无论男女，都倚窗填窗而观，可惜夷服太觉不类。其男浑身包裹紧密，短褐长腿，如同演剧扮作狐、兔等兽的形状。其帽圆而长，颇似皂役，……其发多卷，又把长的剪去，仅留数寸。多长大胡子，突然见了能叫人惊怕。粤人呼为鬼子。妇女头发发式分梳两道，或三道，都无高髻，衣服则上而露胸，下拖重裙。婚配皆由男女自择，不避同姓，真是夷俗也！”⑯从这些充满新奇的记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是清朝道光年代身为中国官员的林则徐，而不是百年后某些中国学者既定倾向中的林则徐。不过，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比起来，只在少部分地方对西方显出不同的眼光，他已经很了不起了，开先河了，我们不能苛责前人。

林则徐通过“澳门”采集的有关“夷情”与心得，有不少内容被魏源收在他那远播四海的海国图志》中，代表着那个时代先进的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最高水平，开启了千百万双愿意睁眼看世界的眸子。他的功业，有如屹立在澳门莲峰庙前的花岗岩雕像一样，永远目光炯炯，正气凛然！

容闳于澳门受西学发蒙

被誉为“留学生之父”的容闳（1828—

1912), 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并取得大学学位的人。他于 1854 年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回国后, 矢志以输入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为手段, 来改造贫穷落后的中国, 使之“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他提出的具体方案是促请清政府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 造就一批精通西学的人材。经过容闳的不懈努力, 清政府于 1872 年向美国派出首批官费留学生, 这是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历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 同时也揭开了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新篇章。容闳因其特殊贡献而被后人推崇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拓荒者和留学教育的奠基人。

容闳能去美国读大学, 并终身为西学东渐奔走呼号, 与其幼时在澳门接受西学发蒙是息息相关的。1935 年, 容闳七岁, 父亲把他送到澳门英国传教士古特拉富的夫人开办的一所西塾读书。为什么容父不步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家庭之后尘, 把儿子送进私塾, 习读书经, 走考秀才、中举人、点状元、做大官、光宗耀祖的科举之路呢? 除了家境贫寒, 很难同时供养两个儿子在私塾读书外(当时容闳的哥哥已入私塾), 更缘于容父另有自己“精明”之打算。原来容闳的家乡南屏镇距澳门不到十里, 虽有一道界墙把澳门与大陆中国隔开, 但这个洋人云集的另一类天地不可能不对近在咫尺的天朝子民有所影响: 不光是早去晚归到澳门与洋人做小买卖的小商小贩, 带回了洋男女当众亲嘴的骇人奇闻, 而且澳门周边地区确实出现了一批因为洋商服务而迅速发家致富的“番薯佬”。这些人虽在洋商面前点头哈腰, 但在乡人面前却摆尽了暴富者之姿态。生活穷困的容父对此是不可能置若罔闻的, 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走一条致富的捷径? 为洋商做事, 要懂得一点洋文, 于是, 容父把容闳送到了澳门的洋文学校。容父的这种心理后来在容闳的自传中找到了答案, 容闳在忆及幼时生活情景时曾说, “惟是时中国为纯粹之旧世界, 仕进显达, 赖八股为敲门砖, 予兄方在旧塾读书, 而父母独命予入西塾, 此百思不得其故。意者通商而后, 所谓洋务渐趋重要, 吾父母欲先着人鞭, 冀儿子能出人头地, 得一翻译或洋务之优缺乎?”^①诚然, 容闳日后所成就的事业则是其父母始料不到的。

鸦片战争开战前后, 西塾因故停办, 容闳暂时返回家中。期间还到澳门一家传教士开办的印刷厂打工, 帮助维持家计。1841 年, 容闳被创立不久的马礼逊教会学校招去续学, 享受免费待遇。1842 年 11 月该学校迁往香港, 容闳也随校到了香港, 在已成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度过了六年学校生活。

在澳门、香港接受西式教育, 不仅使容闳掌握了基础的英语知识, 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而且使其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始对西方人充满了亲切感, 迨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 当该校校长美国人布朗于 1846 年冬表示可以引荐三五名学生同赴美国, 继续深造时, 容闳就毫不犹豫第一个报名, 白发苍苍的老母的眼泪也没能软化他远行的意志。可以说, 正是因为澳门接受了初级的英语教育, 哺育了容闳向往西学、求新求知的情志, 才驱使他跳入西学的文明海洋遨游, 直至寻觅理想的志趣、事业的彼岸。

郑观应寓澳门立说《盛世危言》

郑观应(1842—1922)是中国近代最早提出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 率先揭开了近代民主与科学思想启蒙的序幕。他的一生与澳门有着密切的联系。

郑观应的家乡香山县雍陌乡与澳门近在咫尺, 他自幼出入澳门, 对那里的风物熟悉得如数家珍。19 世纪六七十年代, 他撰写了大量揭露澳门丑恶现状的文章, 如《澳门猪仔论》、《澳门窝匪论》、《续澳门猪仔论》、《求救猪仔论》、《论禁止贩人为奴》、《救猪仔巧报》、《记猪仔逃回诉苦略》、《贩奴》, 这些文章都被他收入宣传维新思想的名著《救时揭要》和《易言》中。他以愤怒的笔触, 痛斥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利用澳门作巢穴, 怂恿拐徒贩卖中国“猪仔”到秘鲁等地充当苦力的罪恶勾当, 对被贩卖者的悲惨遭遇表示了深切的怜情。他以“世居澳门, 素知底蕴”的体悟^②指出: 澳门约有“猪仔馆”二百家, 关押着数以千计的华工, 他们都是被拐骗来的, 有的甚至“竟被布袋笼套拉牵而去者”^③。被拐出洋者的遭遇更是惨不忍闻, “有半途病死者, 有自经求死者, 有焚凿船只者, 要之皆同归于尽, 即使到岸, 充极劳极苦之工, 饮食不足, 鞭撻有余, 或被无辜杀戮, 无人保护, 贱同蝼蚁, 命若草菅。”^④由此造成的悲剧是: “父失其子, 妻丧其夫, 长离桑梓, 永溺风波, 有死别之悲, 无生还之望。”^⑤他强烈呼吁禁止这项罪恶的贸易, 指出: “即使澳门一隅, 实系西人管辖其地, 亦当设法禁止。万国律法, 未有不衷乎义、循乎理者, 以理折之, 亦当无词以对, 则其禁止亦不难也。”^⑥除论“猪仔”问题外, 郑观应还揭露了澳门的聚赌窝匪之情形, 慨叹“盗贼之炽, 奸宄之多, 余足迹半天下, 从未见有如澳门之甚者也!”^⑦

从 1886 年到 1890 年五年间，生意场上遭遇重大挫折的郑观应赋闲澳门家中，过着隐居生活。然而，他并不是无所事事，而是抱着忧时愤世之情怀，利用这段清闲的时日，集中精力完善他日渐深刻的维新思想，体现他成熟而完整的维新思想体系的《盛世危言》得以在寓所著成。

《盛世危言》是在《易言》的基础上扩写而成的。该书的中心思想是“富国强兵”，主张设立议院，讲求武备和发展工商业，废除以八股时文取士的制度、以西学培养新式人材，提出以兵战对兵战，以商战对商战的国策。该书刊印问世时，正值甲午中日战争中方失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变法呼声高涨的时期，备受各方面的重视。礼部尚书孙家鼐、安徽巡抚邓华熙将《盛世危言》推荐给光绪皇帝，邓华熙在荐疏中称该书“于中西利弊透辟无遗，皆可施诸实事”^{②1}。光绪帝命总理衙门印刷二千部散发给大臣们阅看。湖广总督张之洞将当时论时务的书与《盛世危言》作比较后认为：“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统筹全局择精语详，可以坐而言即以起而行也。”赞扬该书：“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鉴之度。”^{②2}翰林院编修蔡元培也推崇该书“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今世利病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②3}时人的《盛世危言》热，就是因为该书的思想、主张反映了富国强兵、拯救民族危亡的时代呼声。而透过思想深层，更可窥见郑观应高瞻远瞩的时代目光和强烈的爱国情怀。如果说，寓澳五年是郑观应经商、致仕经历中较为灰暗的时期的话，那么，反之可以说，正是这段不得志的时光成就了他在近代中国维新思想史上的英名，而这价值是任何官位和多少金钱都换不到的！

值得一提的是，此间郑观应结识了正在澳门镜湖医院悬壶济世的孙中山。郑对孙的思想和医术十分器重，孙亦受郑氏维新思想的影响，俩人相见恨晚，遂引为同道。当 1894 年孙氏拟上书李鸿章时，不但请郑修改润色其上书稿，而且请郑氏极力引荐。尽管上书尔后如泥牛沉海，但郑确实为孙氏壮了行色。

1922 年，郑观应在上海病逝，次年依其遗嘱移葬于澳门前山，最终叶落归根，长眠于成名于斯的故土。

康梁凭澳门发皇新知

澳门因其特殊的政治条件、人文环境成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重要活动舞

台，他们与澳门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件大事上，一是在澳门创办《知新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一是以澳门作为保皇会的基地，坚持保皇维新斗争。

1896 年 11 月，康有为赴澳门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受到当地富商何廷光等人的热烈欢迎，遂决定将澳门作为维新派在华南的活动基地。他让康广仁留在澳门继续活动，与何廷光筹办一份旨在宣传变法维新的报纸。何氏利用他在澳门的声望，很快便从富商豪绅中筹集股金万余元。股东们都希望时任上海《时务报》主笔的梁启超兼任这份新办报纸的主编，此时，梁启超恰好回粤省亲，故而应邀前来澳门共商办报事宜。最初他们把报名定为《广时务报》，含有推广上海《时务报》和广东的《时务报》两重意思，因《时务报》经理汪康年作梗，他们最后将报名改为《知新报》，由何廷光、康广仁任总理，梁启超、徐勤、吴恒炜、刘桢麟、何树龄、韩文举、王觉任、陈继俨等八人任撰稿人。1897 年 2 月 22 日《知新报》出版了创刊号。初期，每五天刊一期，自第 20 期起改为旬刊，第 112 期起改为半月刊。

《知新报》以宣传维新变法为主旨，经常登载介绍康有为思想的政论，如大同译书局出版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后，《知新报》随即刊登林旭的《春秋董氏学跋》、欧榭甲和徐勤的《春秋公法自序》、《孟子大义述自序》等文章，对康有为的《春秋》、《公羊》以及《孟子》学说加以发挥。梁启超的变法新论也经常刊发于《知新报》上，《公车上书请变动科举折》、《保国会演说》等便是。另外，该报还大量刊载介绍国外时事、科技的译作，开阔了读者的视野。因为内容丰富、论述精湛，《知新报》创刊不久，即声誉四起，行销海内外，成为与上海《时务报》、天津《国闻报》齐名的维新报刊。戊戌变法失败后，在国内宣传维新思想的进步报刊被查禁的情况下，《知新报》却利用澳门的特殊政治环境得以继续出版、发行，成为全国唯一宣传维新变法的报刊。

由于《知新报》的宣传和维新派的积极活动，澳门不少中国居民受到了变法思想的影响，因而维新派倡导的一些社会改良活动得以在澳门倡行。1897 年春，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上海成立“不缠足总会”后，澳门的张寿波、何廷光、吴节薇起而响应，组织“澳门不缠足会”，制订了《澳门不缠足会别籍章程》。1898 年，曾广浏、徐勤等人日本倡办“戒鸦片烟总会”，消息传至澳门，张寿波、何廷光、陈继俨等人随即组建“澳门戒鸦片

烟分会”，发动各界人士加入，为维新言行推波助澜。

戊戌政变后，逋逃海外的康有为依然宣传维新保皇救国矢志以行，很快便在加拿大创立了保皇会，后看到保皇会在澳门有较大势力，又“近内地、通海外”²⁷，便于国内外之联络，遂将保皇会总会移至澳门，踞以为据。

保皇会在澳门的主要活动有二，一是反对慈禧太后废黜光绪帝，1900年1月，慈禧太后谎称光绪皇帝病重，准备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俊为“大阿哥”，消息传来，令保皇会人士如闻惊雷，他们急忙通过《知新报》大造拥戴光绪皇帝的舆论，并在澳门等地倡办庆祝光绪皇帝三十寿辰的庆典，发出恭祝圣寿无疆的呼声。《知新报》对此专门作了报道，称在皇上三旬“万寿日”，澳门“爆竹声竟日不绝”，“澳门镜湖医院各绅商衣冠整肃，望阙输诚。车水马龙，欢声雷动”²⁸，借澳门一隅以张抗议之声威。

与此同时，保皇会决定利用八国联军进犯中国给清廷带来的混乱局面举兵勤王。勤王之师是唐才常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组织的自联军。在澳门的保皇会总会对此武装勤王负全面责任，“内之布置义举，外之联络各埠”²⁹。他们还筹划在广东惠州发动起义，响应唐才常在内地举兵。因为何廷光等澳门人士缺乏军事行动的经验，康有为立即派得力干将徐勤到澳门协助总会工作。他们利用海外华侨的大笔捐款购置枪械，秘密运进内地武装起义军。然而，天不随人愿，武装勤王因内部部署混乱、保皇会未能及时地提供经费给唐才常等原因很快就归于失败。筹划中的惠州起义也不得不黯然取消。经此挫折，保皇会的士气大受影响，尽管以后他们还坚持自己的理念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孙中山在澳门医人医国

澳门既是孙中山走向世界、踏入社会的通途，也是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政治舞台。

孙中山的故乡翠亨村毗邻澳门。少年时期，他曾几度随父兄涉足这块荡漾着异国风情的别样天地，在他好奇的脑际中，或许徜徉着一缕留连忘返的印象。12岁时（1878），他经澳门乘船前往檀香山，接受“欧洲式的教育”，由是眼界大开。后来，他在回首当年远航时的情景云：“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³⁰。五年后，他返国并就读于香港的书院，澳门成为他

往返省港的必经之地。1887年秋，孙中山进入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期间结识了志同道合的陈少白、杨鹤龄、尤烈。他们都是血气方刚的弱冠青年，思想上少有顾忌，常聚在一起针砭时弊、放言革命。杨鹤龄在澳门的寓所经常成为他们的聚首辩论之所，当时他们的亲戚、朋友戏称之为“四大寇”，杨的寓所也自然成了“四寇堂”。

1890年，孙中山致函香山籍退职官员郑藻如，表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提出兴办农会以倡导农桑，立会设局以禁绝鸦片，创置学会、学校以普及教育，并建议在香山试行后推及各地。1892年，此信以《致郑藻如书》发表在澳门的报纸上，后又为香山《濠头月刊》转载，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孙中山最早的政治作品。

1892年7月，孙中山以“最优异”的成绩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随即应澳绅何廷光等人的邀请，到澳门镜湖医院新设的西药局出任首任义务医席，成为澳门的第一位华人西医。同年12月，承澳门士绅吴节薇等担保，向镜湖医院借银1440两，开设中西药局，独自挂牌行医，同时还兼任镜湖医院的义务医席。

孙中山以医术为“入世之媒”，在澳门行医几近一年。他不仅医术精湛，擅治各种疑难杂症，而且医德高尚，善待穷困病人。他行医的事迹，澳门《镜海丛报》多有报道，如在其创刊号中便登载了孙中山治愈的六个病例：

“陈宇，香山人，61岁，患沙林八年矣，辛楚殊常，顷在医院为孙医生割治，旬日便痊精健倍。”

“西洋妇某，胎产不下，延孙治之，母子皆全。”

“卖面人某，肾囊大如斗，孙医用针刺去其水，行走如常。”

“大隆纸店两伴，误为毒药水焚炙心胸头脸，势甚危殆，孙医用药敷之，旬时就愈。”

“某客栈之伴，与妻口角，妻于夜半吞洋烟求死，次晨八点钟，始有人抬到孙馆，如法救之，亦庆更生。”

“港之安抚署书写人尤其栋，患血症多年不愈，华医束手，亲造孙医求治，一月奏效。”³¹

孙中山于悬壶杏林的同时，积极致力于社会活动，结交社会各界人士。除前文中提及的与郑观应的交往外，孙中山还与澳门葡萄牙人连斯哥·飞南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飞南第是澳门土著葡人，会讲广州话，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与其结

识。孙氏初到澳门行医时，曾委托飞南第代其向葡澳当局申请行医执照，尽管孙的申请因其没有葡国毕业文凭未获批准，但他们的交情日深，遂合作创办《镜海丛报》（中英文并刊）。该报创刊于1893年7月18日，于1895年12月25日停刊。历时两年，计出版130多期，孙中山主理《镜海丛报》的中文版。

《镜海丛报》（中文版）刊载了大量言辞激烈、抨击时弊的论说，所署笔名为“黔上味味生”，有人认为这位作者就是孙中山本人。^②报上的新闻大多夹叙夹议，借题发挥。对孙中山的行医活动也多有报道，并刊登过孙的医务广告。

1895年10月26日，孙中山和他的战友策划的广州反清起义，因事泄未及发难即告流产。孙中山乔装潜返澳门，从这里登船逃亡日本，开始了其职业革命家的生涯。11月6日，《镜海丛报》刊载了这次武装起义的“电讯”，介绍孙中山的事迹，赞扬孙中山“习知外洋事态、语言、文字并精西医”，“盖亦聪颖绝伦之士”，“所志甚大”^③。报纸还全文特录孙中山起义前发表的《农学会序》。飞南第这样做表明了他对孙中山的支持。

《镜海丛报》是近代中国第一份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密切相关的报纸。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曾两次踏足澳门。

第一次是在1912年5月下旬，辞去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南下省亲，在返乡途中短暂驻留澳门。故地重游，孙中山倍感亲切，除重聚镜湖医院外，还应邀出席澳门中外各界人士在庐园举行的欢迎会，会后与澳督、主教、政府官员、社会名流等一百多人合影留念，迄今尚留下一张一米阔的珍贵照片。

第二次抵澳是在1913年6月。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于上海火车站，正在日本考察商务的孙中山闻噩耗后匆匆返国驻沪上，与诸同志共商对付袁世凯的办法。6月，孙中山从上海南下澳门，一为探望病危的女儿孙文廷，另一重要目的是会晤时任广东都督的革命党人陈炯明，调和他与胡汉民的矛盾，促使他脱离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宣布广东独立。广州《民生日报》6月26日报道：“此次孙中山返里，踵门叩谒者络绎不绝。20号午，新任粤督陈炯明乘坐江汉兵船，由省启行，至下午八点钟抵澳。随命人请孙中山下船谈话，孙赴兵船，约谈数点钟之久。”^④香港《华字日报》也有报道：“下船谈至深夜两点钟，乃别。而陈亦即命启轮返省，开谈者，是陈因胡汉民

之事难以接受，且胡已于17日乘宝璧轮抵港，故请教于孙如何办法。”^⑤陈炯明在孙的督促下，于7月18日宣布广东独立，举兵加盟“二次革命”的行列。

此后，孙中山虽再未亲临澳门，但因革命斗争的需要，一直关注着这里的动向。

1914年至1916年间，孙中山委派朱执信主持广东中华革命军军务，朱执信在澳门设立了指挥机构。1916年1月，中华革命军在惠州发动讨伐袁世凯走狗龙济光的起义，3月，又发动攻袭广州的战斗，三路武装力量中有一支来自澳门的队伍，由朱执信亲自指挥。两次起义虽均遭败绩，但影响很大。澳门成为中华革命党武装反袁的重要基地。

1919年5月，孙中山在上海发表《护法宣言》，掀起第二次“护法”运动序幕。孙科被派为赴澳门的特派员，在澳门鹅眉街十号设立办事处，发动在粤陆军协力驱逐盘踞广州的桂系军阀莫荣新。1920年初，孙中山命令陈庆云前往澳门，集当地富商的捐款，购得寇蒂斯型水上飞机两架，在珠江口三灶岛海面训练，以配合粤军驱莫。9月27日，杨仙逸等驾机轰炸了广州观音山的督军公署和兵工厂，大壮了护法军的军威。

1921年10月2日，澳门葡兵越界枪击中国军队，并拒绝广州护法政府抗议一事，孙中山遂命令海军派军舰前往澳门近海示威。

1922年6月2日，孙中山在广州接见澳门工会代表，支持他们在澳门“五·二九事件”中反抗葡兵枪杀澳门工人的斗争。次日，广州政府向葡澳当局发出强硬警告，并派陆军和炮舰赴前山驻扎，震慑葡澳当局。

澳门作为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直接或间接的重要基地，孙中山的事业得到了澳门民众的大力支持，孙中山也深受澳门民众的爱戴。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消息传来，澳门各界人士深表悲痛，商界下半旗致哀。3月29日，两万多人冒雨集中镜湖医院，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是为澳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追悼会。

注释：

①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76页。

② 麦天枢、王先明：《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页。

③ 林则徐：《致怡良书柬》第2件，道光十九年二月，见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页。

④ 林则徐：《致怡良书柬》第2件，道光十九年二月，见《林则徐书简》，第44页。

（下转第39页）

搬迁儿童公园，进行大面积考古发掘。文物部门正在制定今后的发掘计划和保护规划，南越国宫署的面目将逐步被揭示出来，人们目睹这一王宫的真容将为期不远。

注释：

- ①《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
- ②《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文物》1977年第4期。

(上接第62页)

- ⑤林则徐：《致怡良书柬》，第29件，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见《林则徐书简》，第72页。
- ⑥林则徐：《致怡良书柬》，第37件，道光二十年正月三十日，见《林则徐书简》，第83页。
- ⑦《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65页。
- ⑧林则徐：《致怡良书柬》第122件，约道光二十年八月，见《林则徐书简》，第140页。
- ⑨林则徐：《致怡良书柬》，第141件，约道光二十年十月，见《林则徐书简》第153页。
- ⑩林则徐：《答奕将军防御粤省六条》，见魏源《海国图志》卷80。
- ⑪来新夏编：《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5—196页。
- ⑫吴乾兑、陈匡时：《林译〈澳门月报〉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
- ⑬林则徐：《致沈鼎甫函》，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2册，第570页。
- ⑭林则徐：《信及录》，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第53页。
- ⑮《林则徐集·奏稿》第682页。
- ⑯《林则徐集·日记》第315页。
- ⑰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 ⑱郑观应：《续澳门猪仔论》，《救时揭要》第3页。

- ⑲郑观应：《求救猪仔论》，《救时揭要》第415页。
- ⑳郑观应：《澳门猪仔论》，同上书，第1页。
- ㉑郑观应：《续澳门猪仔论》，同上书，第3页。
- ㉒郑观应：《论禁止贩人为奴》，《郑观应集》上册，第13页。
- ㉓郑观应：《澳门窝匪论》，《郑观应集》上册，第17页。
- ㉔夏东元：《郑观应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
- ㉕张之洞：《增补盛世危言统编序》，光绪二十三年仲冬，转引自夏东元《郑观应传》第68页。
- ㉖蔡元培：《杂记》手稿，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见高平叔《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页。
- ㉗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0页。
- ㉘《知新报》第123期，第7页。
- ㉙邓开颂：《澳门历史》，澳门历史学会1995年出版，第317页。
- ㉚《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7页。
- ㉛《镜海丛报》光绪十九年六月初六日，“本澳新闻”。
- ㉜邓开颂：《澳门历史》，第324页。
- ㉝《镜海丛报》1896年11月6日，“是日邱言”。
- ㉞广州《民生日报》，1913年6月26日，“孙中山返澳续志”。
- ㉟《香港华字日报》，1913年6月23日。

(上接第50页)

注释：

- ①《广州简史》杨万秀、钟卓安主编，第33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版。
- ②⑤《全粤社会实录初编》（1910年）两粤广仁善堂，全粤社会调查处编印。
- ③《东华三院一百二十五年史》李东海编，第6页，文史出版社1998年1月版。
- ④《十九世纪的香港》余绳武、刘存宽编，第441页，中华书局1994年4月版。
- ⑥《广行善堂章程》（中山图书馆）。
- ⑦《东华三院一百二十五年史》第251页。
- ⑧金应熙《香港今昔谈》，龙门书局1996年2月编，第250页。
- ⑨《番禺县志》卷十五；《番禺县续志》卷二。

- ⑩《申报》1908年7月2日、8日、11日；《天津大公报》1908年7月5日、15日。
- ⑪《全粤社会实录初编》省港澳平菜总公所。
- ⑫《东华三院一百二十五年史》第90页；《天津大公报》1908年7月15日。
- ⑬《东华三院一百二十五年史》第90、289页。
- ⑭《东华三院一百二十五年史》第8页。
- ⑮《申报》1908年8月19日。
- ⑯《东华三院一百二十五年史》第111—112页。
- ⑰《东华三院一百二十五年史》第1页。
- ⑱金应熙《香港今昔谈》龙门书局1996年2月编，第252页。
- ⑲《全粤社会实录初编》广仁善堂。
- ⑳《东华三院一百二十五年史》第251—254页。
- ㉑张晓辉：《论近代香港华商对祖国的凝聚力》，《广东社会科学》，1997年增刊。